

中生代
思想书系

戴震学的形成

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

丘为君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戴震学的形成

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

丘为君

著

中生代
思想书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丘为君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5

ISBN 7-80148-875-X

I. 戴… II. 丘… III. 戴震(1723~1777)—哲学
思想—研究 IV. B24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3895 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政编码:100005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E-mail:newstar_publisher@163.com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1300 1/32

印张:9.125 字数:234 千

版次:2006 年 5 月第一版 200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序：中国式自由主义的自我意识

由于历史已不再能阐明未来，人类的心灵在黑暗中徘徊。

——托克维尔

2001年8月丘为君教授来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学术研讨会，知悉我正在做有关戴震哲学与中国式自由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为君兄告诉我，他写作多年的著作《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即将出版，希望我为该书作序。我认为，为君兄将戴震与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相联系，并以戴震学的形成作为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诞生之标志，这是极为重要的论断，值得思想史研究者重视。

今天一谈起戴震在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位置，学术界常常是处于一种自相矛盾、令人难堪的地位。众所周知，戴震是在儒学内部最早发现“以理杀人”的思想家，从而成为五四反传统、肯定个人欲望和权利的先驱者；但另一方面戴震又是乾嘉考据学代表人物。当他穷毕生精力考证经典时，西方已开始科学革命，知识体系迅速现代化。而一般认为，乾嘉之学的兴起使清代学术陷于远离自然和社会的琐碎考证，无疑对中国近代知识的形成具有负面的作用。戴震集启蒙先驱和考据经师于一身，形成如此大的反差，使得某些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将戴震的考证和他的义理观互相割裂开来。这样一来，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现代化，似乎就和清代思想没有什

么关系。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完全被视为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2000年我与刘青峰、周昌龙、张寿安夫妇和王靖宇教授合作，开始探讨有关自由主义的中国本土资源问题。我和青峰研究的题目是比较戴震哲学的理念型(Ideal Type)和胡适的实验哲学。当时，引起我们做这项研究的是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作为五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会对乾嘉考据大师戴震有终生不渝的兴趣？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来探讨这一问题，并得到两个有点意外的结论：第一，戴震之所以能提出纲常名教“以理杀人”的论断，是由于他持有一种类似于西方唯名论式的方法论。他认为唯有个体或具体的陈述才是真实的，任何普遍的规则，包括纲常名教都只是名，它们之所以正确，无非是反映一个个具体案例的共性罢了。这样，戴震虽然并不反对儒家伦理，但坚持任何伦理原则必须从具体个案中抽出；当用普遍的伦理原则去扼杀人自然的感情、否定具体情景中可以理解的行为时，就可以“以理杀人”。第二，胡适的实验主义真理观表面上来自杜威，但在本质上却是戴震哲学的翻版。

表面上看，戴震建立的考据学知识体系似乎和他的新义理观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将其提高到终极关怀层面来分析，则发现两者恰恰是同一心灵的表现。戴震意识到，唯有个体和具体的陈述才是真实的，这意味着某种有现代意识之心灵在中国文化中的涌现。但与此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为终极关怀，道德背后的基础是常识。一旦抽象、普遍的理不再存在，那么为了理解什么是道德，就必须把修身转化为一种“求知”和“去蔽”的考证活动。这与17世纪新教徒不同，他们是去发现足以证明上帝全能之新奇的宇宙规律。换言之，戴震一辈子建立起来的庞大的考证知识体系，只是在常识理性支配下崇尚个体为真实、追求道德活动的结果。胡适思想模式与戴震的同构的意义更不寻常，两者的同构似乎表明：戴震式的视个体和个别陈述为真实的方法是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自由主义之前提。也就是说，五四

新知识分子也往往同样持常识自然观并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这样，在他接受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时，并不妨碍其知识活动仍遵循类似于戴震的典范。换言之，如果戴震视个体为真实是中国式自由主义的本土资源，那么清代考据学也可以视为中国近代知识论述的源头。

我们说，戴震的心灵和学术活动具有某种现代色彩，绝不是说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和自由主义是从这一源头发展出来的。无论现代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还是个人权利、民主共和观念，均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所谓中国式自由主义将戴震哲学作为自己的本土资源，其准确含义是指当五四后知识分子接受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以学术作为终极关怀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心灵和戴震存在着同构性。这样一来，中国近代知识之诞生和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形成是同步的，而且所谓中国近代知识体系，并非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主体，而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知识活动的某种特殊典范。这一典范之成熟和戴震学的形成关系密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戴震学如何形成，是追踪中国式自由主义心灵在西方冲击下产生之过程，它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这正是为君兄的这本新作《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的意义所在，它为中国近代知识论述之诞生与思想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众所周知，对戴震的介绍、研究和推崇主要是通过章太炎、梁启超和胡适三个人的工作来实现的。但为什么恰恰是他们三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各对戴震学的形成作出了怎么样的贡献？戴震学形成的思想史的含义又是什么？为君兄用富有说服力的证据指出，戴震学的凸现意味着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而章、梁、胡三人正好代表了戴震学形成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章太炎有多重角色，首先他作为古文经学大师，也是清代考据学的传人，深知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知识

体系绝非支离破碎,而是存在着自身的意义结构的。其次章太炎是唯识论最深刻的论述者和倡导者。唯识论视社会组织、群体为虚幻,使得章太炎是晚清最早的个体主义者。事实上,也正是这两个思想史因素使得章太炎成为戴震学的开启者。

如果说章太炎注意戴震是由于某种思想倾向上的巧合——对考据意义结构的了解和唯识论的个体主义,那么梁启超对戴震之重视则代表了对自由主义中国本土资源的意识。为君兄十分深刻地指出,梁启超是在他生命最后十年才认识到戴震学的重要性,这是梁启超政治生涯失败转而以学术为志业的结果。梁启超与严复同为西方自由主义的最早介绍者,但他在政治哲学甚至思想方法上,从未认同过唯名论,也不是一个个体主义者。何况作为康有为的学生,从事今文经学的早期经历而使得梁启超不太能理解戴震考据系统的意义结构。那么,为什么梁会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推崇戴震,并成为促使戴学在中国诞生的第一人呢?正如为君兄所指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梁启超发现戴震追求知识之方法和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相合。梁启超已经感受到,五四后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果以学术为志业,那么戴震和相应知识体系是不可忽略的中国传统。

梁启超虽然可以视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也是戴震学的催生者,但梁启超的思维模式不能代表五四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学术活动典范也与戴震不同。真正与戴震心灵同构的现代知识分子是胡适。胡适在成为五四时自由主义代言人之前,并没有读过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但胡适一看到此书,就被其吸引,认定戴学是中国新时代科学的哲学之源头,并从此一生为捍卫戴震在中国学术界地位和道德形象而奋斗。正因为他的提倡,确立了戴震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为君兄详细讨论了胡适对戴震新义理观及研究方法的论述。我认为这一论述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中国式自由主义的成熟和自我意识之呈现;第二,正因为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考据之学只是崇尚个体的心灵

在常识理性限定下从事学术之结果，那么类似的知识论述一旦诞生，并不会随着社会现代转型而终结。事实上，无论是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还是1920年代末中国式自由主义者转向纯学术而发起的古史辨运动，不是戴震知识体系之现代继续吗？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看法只是我阅读为君兄著作的心得，绝不能用它来代表这部著作复杂而深入的内容。我只是想用此来凸现这本书的重要性。为君兄和我谈起戴震学的研究，常感慨今天的学人因该题目过专过窄而轻视它，甚至认为与现代毫不相关。我对此深有同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思想史上，人类越是陷入某种思想典范之时，对这种典范之起源则越不感兴趣。今天随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凸现，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陷于戴震式的学术研究吗？至今我仍记得与为君兄谈话时的情景，悠扬的上课钟声阵阵传来，在相思树林的上空回响。不知何故，我心头涌起一种难言的伤感，已经多少年没有听到这种钟声了。思想史研究者是以思想的兴起和演变作为学术研究的人。在戴震的时代，道德真理和历史终极意义尚未解构，以求知为终极关怀的个人主义心灵虽然紧张，但还不至于陷于空虚和绝望。而今天自由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之否定，不得不在越来越琐碎的知识追求中消耗生命。这时追溯戴震学的形成确实是意味深长的。它使我想起了梅瑞慈寇夫斯基(D. Merezhkovskii)在《先行者》中的诗句：

“这里是一位醒得太早的人，当时四周幽暗，万物皆在沉睡。”

它不仅属于戴震，也属于今天不甘于沦为细微琐碎知识追求之思想史研究者。

金观涛

导 言

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清末民初的研究，不论是美国、日本，或者是大中华地区，都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那便是倾向于“传统崩溃”及其所衍生的相关议题。以北美来说，自 20 世纪中叶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里取得领导地位、并以提出“西力冲击说”(theory of Western impact)而建立其学术特色的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不论是在他影响深远的早期代表性著作、1948 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或者是在史学专题领域里建立其典范地位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1842—1854》(*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1953 年两册本)，或者是他晚年心力灌注所在、以“略远详近”作为风格的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1992)中，“传统崩溃”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就费氏而言，中国迈向现代的过程困难重重，其关键在于盘踞中国达千年之久、作为中国文化基调的儒家学说与思想。在他看来，带有“禁欲主义”(asceticism)世界观特征的儒家思想，与强调“世俗主义”(secularism)的现代性，本质上是互相冲突的。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的崩溃，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儒家中心观”的崩溃。

对照美东史学理论兴趣相对薄弱的费正清，理论意识强烈、建构宏大体系企图的柏克莱加大李文逊(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则更将这种“传统崩溃”研究特质,淋漓地表现在他有关中国研究的主要著作中。这位被美国学界称之为“莫扎特型”(Mozartian)的学者,在他1965年出版的三卷本代表性著作《儒家中国的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里,展现了与费正清见解不相悖的观点。李文逊认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基本上在反应西方的挑战(Western challenge);然而由于无法有效响应来自带有扩张主义企图西方挑战,中国最终是屈辱地被迫放弃它自认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从而接受“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意义上的“现代化”。此一转变,是中国由作为“绝对性”象征的儒家世界大同主义,转向“相对性”的西方实用主义价值。就意义而言,由于儒家世界大同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中国此一转向也就意味着传统儒家已经敲响了丧钟。同费正清的立场一样,这位早逝的犹太裔美籍学者坚信,中国的儒家传统与现代性是不相容的。

最能结合理论与实际以开展“传统崩溃”课题的学者,恐怕要属在近代中国研究领域享有崇高声望的日本京都大学小野川秀美(1909—)。与美国费正清和李文逊属同一时代崛起的学者,小野川秀美在他的代表性研究里,展现了与美国“西方本位主义”观点不同的风貌。不同于费、李两氏的消极性论点,小野川认为中国在晚清对西方挑战所做的响应,其实是生机盎然的。在其享誉学界的名著《清末政治思想研究》(1960)中,小野川氏从“中国中心观”出发,以洋务论、变法论及革命论等三阶段作为叙述架构,生动地阐述了晚清高潮迭起的政治发展:1860年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论、1890年代以“经书”与“西政”为核心的改革论,以及1900年代与变法派合作终至分手的革命派的论述。小野川秀美的洋务论、变法论及革命论等三阶段论证,表面上看似比费正清和李文逊具化约论倾向的“挑战/响应”(challenge-response)说细致与繁复,但本质上仍然不脱“传统崩溃论”取径,即便小野川秀美本人并不刻意地展示自己为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的

积极支持者。

在大中华区域,就中国大陆而言,“传统崩溃”更是清末民初时期研究者的基调。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大陆学人在1990年代之前,似乎倾向于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僵化地诠释中国在近代时期所做的转变。以曾经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1918—2000)为例,他基本上并不全然认同洋务论、变法论与革命论等具有“政治性质”的三阶段论证,而是主张从“社会性质”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变革,赞同一种为中国大陆学界与政界所接受的共同看法,认为中国传统的彻底终结,应该以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界线,在此之前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110年历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可以界定为“中国近代史”;在此后的“社会主义时代”,则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史”。

在代表性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0)里,胡绳将上述的“社会性质”史观,用马克思学说的“阶级革命”理论与“反帝斗争”观点,进一步地以四期来探讨中国从晚清至民初之间的变动与变化:第一期,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第二期,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第三期,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第四期,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根据胡氏,第一期与第二期的社会革命力量是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农民,至于第三期与第四期的社会革命力量则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姑且不论胡绳分为四期的“社会性质”历史观点是否比小野川划分成三期的“政治性质”历史观点来得有效,他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视为传统秩序崩溃与新秩序建立之分水岭的史观,其“政治性质”事实上是十分明显的。

对照“传统崩溃论”主张者的研究取向,本研究旨趣正好相反,它重视的不是相对具消极性意义的崩溃面向,而是强调中国传统在转进现代(modernity)时,若干具有积极性的建设性面向。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在转进现代之际,并不是以“全面性溃败”作为惟一

的反应,它也有其他适宜的应对机制。从物质层面(尤其从军事层面)看,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掠夺本质,作为亚洲长期第一强权的中国于19世纪下半叶全面而快速溃败的表现,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若从文化层面看,情况似乎没有那么悲观。事实上就清末民初时期而言,相对政治与军事层面上每况愈下的表现,文化创新的力量,则可以说是活力充沛的。吊诡的是,文化上这种生机盎然的现象,却是与为人所诅咒的、逐渐升高的国内外压力有关。

如果说压力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那么与此一字眼接近的“张力”(tension)或许更贴切我们所关切的课题。从历史角度看,当某一社会在经历剧烈变动时(例如由传统急遽转入近代),经常会面临某种难以承受的“张力”状态。由于没有更恰当的字眼来形容此一“张力”情境,我们姑且称之为“转化中的张力”。以近代中国为例,这种带有焦虑特质的“转化中的张力”,至少与两种变化有关:第一,来自帝国外部的力量;其次,来自帝国内部的力量。前者相对容易理解,它主要是与西方列强(及稍后的俄国与日本)的帝国主义有关。此一力量对有200年帝国霸业的清室造成何种心理压力,我们可以从专制王朝最敏感的军事武力一项窥见一斑。当外来的、带有强制意图的西方(及俄、日)扩张主义,逐渐发展成清朝建国以来前所未见的军事与外交压迫时,以少数民族(满族人)为基础的统治精英,除了竭尽所能寻求体制内各种应变资源,同时还冒着巨大危险,去接受体制外的、极可能带来不确定后果的其他资源——国家体制外的地方武力组织,以共同对抗因外患而趁机挑战国家体制与社会秩序的本土性叛乱团体。

然而“转化中的张力”并非如多数人所注意到的,纯粹是由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压迫所启动的。事实上,它也有很大的部分是来自内部的力量:例如作为社会变迁重要指标的人口成长,便是在清末民初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一场准“马尔萨斯式困境”(Malthusian predicament)。根据何炳棣的研究,18世纪初叶,中国人口大约在1亿5千万左右,但不到100年却暴增一倍,于1794年到达3

亿1千3百万人。在这种近乎戏剧性变化的发展里,中国人口到了1850年的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更是激增至4亿3千万人。如果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的古典人口理论,即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呈算数级数增长,具有参考价值的话,那么像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度里,在耕地面积与耕种技术未能有效突破的前提下,人口大增便意味着耕地面积相对减缩与生计问题相对困难。作为被马克思所注意到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农民起义事件,太平天国革命军能在江南的16个行省中攻占300多个重要城镇,并使内战绵延达14年(1850—1864)之久,显然与中国当时的农民生存困境有关。

上面的“传统转化论”说明,并非意味着作为理解近代中国变革现象的“传统崩溃论”历史解释无效,或者是说,儒家秩序的崩溃不曾存在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里。的确,就外貌而言,作为传统学术与文化权威的“经学”,是在处于瓦解而不是增强的过程。我们这里所想指出的是,中国传统(不论是儒家还是非儒家的)在晚清那个经历时代的巨变里,并非纯然以“全盘性崩溃”的面貌来反应西方的挑战。事实上,“转化中的张力”在某种意义上,启动了中国知识精英的某种潜能。这种潜能,有些确实是出自儒家的“经世”意识,例如适时地引进“优胜劣败”的进化思想,或者积极地阐释与鼓吹“富强”的观念,便是对当前政治社会危机做出有效的反应。但是,这种潜能也有不少甚至是超越了现实中的危机,而指向更深层的关怀,例如像对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探讨,以及对生存之本质或生命之价值与意义做出不凡的思考等。

本研究的课题不是关于考据学在“后清时期”的发展。作为考据学泰斗的戴震之思想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也不是本书的重点。基本上,我们这里提出了这么个问题:在激烈地批判甚至是否定传统的过程中,“转型期中国”(1895—1925)就知识与思想发展的角度而言,经过了什么样的历程而有了今天的风貌。或者更精确地说,“转型期中国”的代表性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与胡适,在他们

对传统的激烈批判里,如何有意识地诠释并转化那个被诅咒、污名化的“传统”——尤其是儒学传统,并进一步地使它与自西方引进、具有威望的所谓“科学知识”接轨。在这个“旧酒新瓶”(也许是“旧瓶新酒”)的改造工程中,我们看到同时拥有相对丰富知识资源(包括传统与现代)的章、梁、胡三位启蒙学者,凭借着他们在中国知识界的不凡影响力,将18世纪的知识领袖戴震,转化成一个近代的文化生产场域,并产生了我们这一时代的重要知识论述(intellectual discourse)。

必须指出的,本研究并非要探讨“后戴震时期”的“戴震学”,或“戴震学派”在“后戴震时期”的形成与意义。因此基本上我们不拟上溯到18世纪那个以考证作为形式的知识论述。在方法论上,我们强调的是探索“戴震学”现象的“开始”(beginnings)(更精确的说,在近代的开始),而不是具有无限上纲意义的“源头”(origins)。诚然,“开始”与“源头”意思接近,不过从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角度而言,两者意义却不相同:“源头”意味着“原因”(causes)而“开始”则意味着“区别”(differences)。职是之故,本书对考证学在传统中国的发展与意义着墨不多;但是对章太炎、梁启超与胡适这三位近代中国最具威望的理论家,在其区别地诠释考证学的近代意义上,则有所关注与分析。

目 次

序:中国式自由主义的自我意识	金观涛 1
导言	1
第一篇 章太炎与戴震论述的开启	1
第一章 批判的汉学与汉学的批判	3
第二章 戴学在清学中的地位认定	23
第三章 作为清学中坚的戴学系统	38
第二篇 梁启超与戴震论述的诞生	57
第四章 戴震学的诞生	59
第五章 梁启超戴震研究的方法与特色	81
第六章 戴东原的哲学	100
第三篇 胡适与戴震论述的典范	125
第七章 从批判传统到新诠国故	127
第八章 戴震“新哲学”的历史基础:反玄学运动	143
第九章 戴震“新哲学”的内涵:道论、性论、理论	159
结语	196

2 戴震学的形成

附录: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	212
前言	212
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	213
钱穆的“每转益进说”	229
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	242
结论	258
参考文献	265

第一篇

章太炎与戴震论述的开启